DOI:10.19789/j.1004-9398.2019.02.015

北京联合大学“环境考古”主题研讨沙龙(第3期)纪要

张俊娜 曹美丹 王长春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北京 100191)

为了加强地理学者和考古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鼓励和支持青年环境考古学者的研究,促进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2018年4月14日,以“考古文化交流与地理环境”为主题的“环境考古”主题研讨沙龙(第3期)在北京联合大学举办.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北京文物保护协会、兰州大学、山东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河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赤峰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前来参会. 本次沙龙共有四位学者进行了专题报告,参会人员在报告后展开了热烈的主题讨论.

1 会议开幕式

会议开幕式上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院长张景秋教授、历史文博系主任顾军教授,以及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莫多闻教授分别致辞.

张景秋教授和顾军教授分别代表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和历史文博系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指出环境考古是考古学科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期沙龙以“考古文化交流与地理环境”为主题,涉及“一带一路”和古代中国文化的传承交流,会在不同的视角给我们新的启迪.

莫多闻教授回顾了环境考古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现状. 首先指出环境考古是在19世纪中叶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最早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欧洲的一些考古发掘中,就开始了人类文化同环境背景关系研究的实践. 国际上的环境考古大致可以分为上世纪中叶以前和上世纪中叶以后两期. 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正式提出了环境考古的概念. 上世纪中叶,由于自然科学中生态学发展的影响,以及新考古学的兴起,开始强调人类文化对环境的适应,环境研究不再只是作为人类文化背景而进行的交叉研究,而是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解释古文化形成与变迁的重要前提. 这一观念的变化对环境考古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发展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也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20世纪初期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包括仰韶、周口店、安阳殷墟等重要遗址的发掘研究,都做了地貌、动植物遗存等的研究,考古学和自然环境的研究有较多的结合. 50~70年代,新石器考古学发展较快,由于忙于构建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相对忽略了自然环境和人地关系的研究. 周昆叔先生等在60年代开始将孢粉分析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促进了植物遗存及所反映的古气候同人类文化关系的研究. 80年代初,严文明先生等多位著名考古学家提倡为促进考古学的发展而加强环境考古研究. 与此同时,周昆叔等学者大力开展环境考古学的理论探索与研究实践,组织成立相关学术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中国环境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 回顾环境考古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后,莫多闻教授对环境考古学目前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认为这些年我国环境考古学发展的势头非常好,国家项目对环境考古的支持力度也很大,环境考古学的认同度越来越高,我国的环境考古学将会有一个辉煌的明天.

收稿日期:2018-06-26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 会议主题——考古文化交流与地理环境

2.1 上午主题报告及讨论

(1) 主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以“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和传播路线”为题,介绍了小麦在西亚的起源和在世界范围的传播. 接着切入主题,首先探讨了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在综合分析30余处考古遗址出土早期小麦遗存的近百例测年数据的基础上,认为至迟在距今4 000 a以前,小麦已经传入中国,并广泛分布在中国北方地区及西南地区. 根据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出土小麦遗存的年代判断,小麦传入中国时间可能早到距今4 500 a. 其次,针对小麦传入中国的传播路线这一问题,结合新的考古发现和分析,提出了小麦传入中国的三条路线——草原通道、绿洲通道和海洋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以“早期文化交流的环境背景”为题,对文化交流的概念、内容、方式、途径等几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文化交流的环境基础,认为地理通道会影响交流的途径,自然资源会影响交流的方向,局地环境会影响交流的内容,气候变化会影响交流的时机. 随后通过对中国境内的四个案例——“晋南仰韶文化东庄类型向岱海地区的移动,老虎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造律台文化的南下,长江中下游之间新石器时代的交流,齐家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交流”,以及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三个案例——‘彩陶之路、赛依玛-图宾诺-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东渐、战国时期阿尔泰-阴山文化系统的西渐”的分析,进一步论述了自然环境对早期文化交流的影响.

(2) 讨论.

上午的两场主题报告结束后,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杨晓燕研究员主持,各位专家学者针对小麦传入中国的路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通道、文化交流的相互性与影响因素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专家学者们首先对韩建业教授报告中划分的欧亚大陆三个文化圈以及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有着重要地位的新疆通天洞遗址进行讨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指出,通天洞遗址的下层为距今4万多年的旧石器文化层. 旧石器考古与环境考古的联系非常紧密,裴文中先生就曾指出学习旧石器考古要学会四条腿走路,即考古学、古人类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地质学主要就是环境背景. 韩建业教授划分的东、西两个文化圈,代表了西方文明和东亚/东南亚文明,而这两个区域从旧石器开始,就已经表现出了具有明显差异的文化面貌. 第三个北边的圈正好反映了东西交流,也就是赵志军老师所说的草原通道,从旧石器时代看也是这样的. 而通天洞遗址正好位于3个圈中心交汇的位置,证明这里是中西文化交流非常关键的路口. 距今45 ka左右,通天洞的气候状况较为温暖,草原通道环境较好,为东西方交流提供了比较便利的条件,这时北边的通道是比较清楚的. 对许家窑等遗址的研究也反映了当时存在文化与基因交流.

赵志军研究员也指出韩建业教授划分的三个文化圈非常重要,从旧石器开始到今天,这三个文化圈一直都存在. 通天洞遗址出土的小麦从麦粒形态上来看,与中国东部发现的小麦粒有所不同,这说明通天洞遗址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并指出草原通道是一个从文化角度上提出的概念. 天山北路再往北就进入了戈壁和草原,然而沿着天山北麓的山前区域,存在着一条条从天山上流淌下来的河流,使得天山与戈壁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 而这些适宜农耕生产和人类活动的山前河谷地带构成了草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夏正楷老师所说的南北通道问题,赵志军研究员认为草原通道和内地农耕文化分布区域之间是有南北通道的,而且都是沿着河谷走向,当从草原通道进入到中国境内后,见到河谷就存在往南走的可能性. 例如黑水河就是草原通道南下并连接绿洲之路的一条南北向通道. 分布在河西走廊的几条源自祁连山积雪的内流河中,以黑水河水量最充沛,往北流的最远,由此成为了史前文化交流的一条通道,目前的考古发现也可以证明这条通道. 河套地区沿着南北走向的黄河谷地也应该存在通道. 桑干河和永定河谷也是南北向通道,只要小麦穿过了桑干河和永定河这条通道,就进入到了太行山东麓. 太行山东麓实际上是一条廊道,东边是黄河,西边是太行山,向南直达山东,进入山东半岛,这样,在山东半岛考古发现的小麦年代最早就可以解释了.

赵志军研究员进而阐述了自己倾向于草原通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道是小麦传入中国的主要路线的 3 个原因. 第 1 个原因是,对于早期文化的交流,草原通道相对比较便捷,沙漠、草原相比山川河流来说更适合早期人类流动和迁徙. 第 2 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显示,青铜冶炼技术的传播是走北边的草原通道. 第 3 个原因是,目前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具有准确测年结果的早期小麦遗存中,年代最早的都出土自山东半岛,这种异常现象只能是草原通道可以解释的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杨晓燕研究员指出除了洋流和黑潮,人类从大陆向东南亚殖民的过程中,有一种可以在海洋上航行非常远的艇. 赵志军研究员也表示有人做过实验,从台湾海峡通过菲律宾然后到南太平洋诸岛,宽松的连在一起的双独木舟是可以在海洋上长期漂流的. 而且国外的一些研究显示,古人在用很简单的航行工具沿着海岸进行远距离航海漂流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王锦秀副研究员提到西双版纳地区的澜沧江、台湾南岛等地也都有乘独木舟捕鱼的情况. 说明从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

另外,赵志军研究员表示讨论早期文化交流一定要放在长期的时间段去考虑,要考虑到无数的文化群体的相互接力. 韩建业教授也表示赞同,并用南疆的例子说明了这种文化接力的现象. 就此问题,专家学者们展开了对文化交流的影响因素的讨论. 夏正楷教授指出地形、语言、气候等都是文化交流的障碍,尤其是气候状况对人类的影响最大. 赵志军研究员表示赞同,认为文化交流的影响因素非常多,尤其是远距离和大范围的交流,一定不能忽视中间各种因素对文化的制约和影响. 对于农业来说,气候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换了一种环境就不能生存. 因此韩建业教授认为走适合农业发展的绿洲通道对小麦传播更加便捷,更加合理. 另外还要考虑到小麦生长的季节、环境等因素,以及早期文化的互相交流和影响. 华盛顿大学在中亚地区做了一项关于文化传播的研究,将影响文化交流传播的地理、气候、人文等因素和两个不同文化的间距等各项数据放在一个计算机的模型里进行计算,最后得出中亚地区文化全面铺开和相互接触的时间是 100 年. 因此,古人文化交流的能力可能被低估了,早期文化传播的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

中国科学院植物考古研究所王锦秀副研究员提出,目前山东出土小麦的年代较早,形态学是否清楚的问题. 赵志军研究员认为要确定考古出土小麦究竟是一粒,二粒,还是六倍体,要从基因上来讲,从形态上还不能确定. 很多学者发现绝大部分传入中国东部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小麦都属于小粒型,比西亚的小麦短小. 杨晓燕研究员也从大麦基因研究的例子说明,东亚和西亚大麦从基因上的区分还是比较明显的,东亚的大麦基因信息接近青藏高原的野大麦,西亚的大麦则非常接近两河流域的野大麦. 王锦秀指出,考古发现的植物遗存除了农作物,应该还有药物等其他用途的植物,但目前在考古报告中很少提到. 杨晓燕指出浮选法出现以前,没有技术去发现这些植物遗存,现在学者最先关注的是农业和农作物,对其它植物的关注还比较少.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研究所吴研副研究员介绍了自己所做的陕西东阳仰韶文化遗址水稻植硅体的研究. 赵志军和杨晓燕研究员也都肯定了西山坪等西部遗址发现水稻的意义. 韩建业教授认为通过 DNA 等技术研究农作物在生物学上的联系,跟文化、思想和技术方面的交流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福建师范大学的左昕昕副教授提出,是否能从单个遗址的尺度来确定文化交流的内容、动力及原因.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张俊娜博士介绍了四川罗家坝遗址的例子,通过环境考古研究,证实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晚期古人类生活在大巴山峡谷河流周围的河漫滩上,河漫滩会被季节性洪水所覆盖,不适宜长期稳定生存,正好可以解释罗家坝人选择渔猎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模式. 而大巴山的褶皱山系里面由很多河流冲击的峡谷,还有小盆地,从地理环境上来说,是非常适合人群迁徙移动的通道. 左昕昕副教授又提出怎样判断环境是古人类交流的动力的问题. 夏正楷教授回答环境灾害事件往往是人群迁徙和交流的重要动因. 韩建业教授也提出庙子沟遗址的案例,认为要说明灾害事件的影响,仅通过单个遗址还不够,要结合区域多个遗址的共同现象来看问题,因为自然灾害如洪水的影响往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陈相龙副研究员指出,通天洞遗址发现的早期的 3 粒小麦年代都在距今 5 200 年左右,阿尔泰山南路是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即阿尔泰山山系往南,沿黑河向南进入河西走廊,草原通道的具体路线怎么去考虑的问题. 另外如果走草原通道,可能没有大面积像绿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洲通道那样可以种植小麦或者是大麦的农田,但是可以开展畜牧,畜牧活动或许是比小麦和大麦的种植更普遍,是一种更便于人民在草原一带开展生计的方式. 无论从阿尔泰山南麓下来,到河西走廊地区,或者从东边,还有赤峰、内蒙古东南部,到河北北部的地区,和农业相比,畜牧业对南北文化的交往影响是更关键的. 并提出了怎么看待人们在进行文化交往的时候,动物和植物这两种驯化品对整个文化交流的影响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赵志军研究员回顾了自己以前提出的两个理论,一个是史前东西文化交流高速路概念,草原通道就是一条文化交流高速路,传播起来会比翻越山川河流的其他路线传播速度更快; 另一个就是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文化包裹论,即起源于西亚的小麦、绵羊和山羊、以及青铜冶炼技术是一同由西向东传播的,犹如一个文化包裹. 被分布在广袤的欧亚大草原上的诸多青铜文化接力传递. 但现在的考古发现中,出土小麦和山羊、绵羊、青铜器等关系似乎还不是很紧密. 陈相龙则肯定了文化包裹理论,认为人类纯粹吃麦子并不足以维持生活,牛和羊会季节性寻找迁徙的路线,对打通草原通道是非常关键的.

2.2 下午主题报告及讨论

(1) 主题报告.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博士报告的题目是“见微知著: 从扎赉诺尔蘑菇山鲜卑墓地出土古罗马玻璃珠看汉晋时期的草原丝路”. 通过对呼伦贝尔蘑菇山墓地出土的两件夹金(银)玻璃珠的材质、制作工艺、化学成分等研究,判断这两颗珠子都是从古罗马进口来的贸易珠,并推测其很可能来自地中海东岸古罗马帝国时期的玻璃生产中心. 这一案例证实至少在汉魏时期鲜卑和古罗马帝国存在以贸易形式表现出来的物质文化交流,并证明草原丝绸之路或者是草原之路在中西交流中的作用很大,而且各种证据都显示呼伦贝尔草原实际上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枢纽,应是草原丝路东西转向南北的重要拐点.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昱龙博士以“关于华北地区石叶技术来源的探讨”为题,首先以河南登封西施遗址为例,将西施遗址的石叶技术分为棱柱状石叶石核和窄面石叶石核两类,细石叶技术分为柱形细石核、非两面器传统楔形细石核和船形细石核三类. 其次对华北地区含石叶技术的遗址如下川遗址、油房遗址、柿子滩 S29 地点、龙王辿遗址、塔水河遗址、小南海遗址等进行分析,梳理了距今 30 ~ 20 ka 华北地区石叶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阿尔泰地区距今 90 ka 以来、蒙古贝加尔湖地区距今 40 ka 以来、华北地区距今 45 ~ 20 ka 石器工业发展脉络的对比分析,探讨了华北地区石叶-细石叶技术的可能来源与扩散线路.

(2) 讨论.

下午的两场主题报告结束后,由首都师范大学李拓宇博士主持,各位专家学者针对史前和历史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的传播通道、文化交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新疆全新世时期的环境状况、植物微体化石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王幼平教授表示,下午两场讲座还是上午东西文化交流传播通道问题的延续. 通过观察石叶、细石叶的扩散路线,发现绿洲通道和草原通道跟环境变迁有很大关系. 从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迁徙、文化交流的方向来看,跟气候的关系非常密切,简单来说在旧石器时代,MIS3 阶段暖的时候表现的是东西向通道比较清楚,MIS2 阶段变冷了以后,北边是整体往南边走,表现为南北的通道. 接着莫多闻教授提出了绿洲通道和草原通道是冷的时期还是暖的时期为主的问题. 王幼平教授回答,气候冷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南北向走的,东西向的绿洲通道的可能是开始得更早更重要,更早的时候草原通道不能走,因为高纬度地区寒冷,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不会做衣服,不会做帐篷,所以那时候高纬草原通道是走不了的. 中国科学院植物考古研究所孔昭宸教授提问了石器的用途,王幼平教授解释了石叶工具的用途以及适合高流动性人群的特点.

杨晓燕研究院提到国外学者从非洲洞穴里距今 200 万年的石器上提取出了淀粉粒,王幼平教授也提到在埃塞俄比亚开会时有从距今 170 万年石器上提取出淀粉粒的报道. 接着,专家学者们针对石器上是否能长期保存淀粉粒的问题展开讨论. 赵志军研究员对此表示怀疑,除非有特殊的保存环境,否则石器上很难能保存淀粉粒. 杨晓燕研究员表示早期石器为一器多用,从石器上提取淀粉粒确实十分困难. 但是实验发现现代土壤里提取不到淀粉粒,主要机理是淀粉粒接触土壤微生物很容易被腐蚀掉. 石器上面能够保存淀粉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风干之后淀粉粒就能够保存下来,而且淀粉含量是比较高的,一个种子里面有数不清的淀粉,只要能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残存亿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就已经足够提取了.

孔昭宸研究员表示植物考古为环境考古探讨农作物起源做了很大贡献,但是更希望环境考古能开辟一条新路,比如从对雄安新区考古调查时的发现来看,白洋淀湿地的演变导致很多考古遗址被掩埋到地下或水下了,湿地环境演变和考古遗址的关系,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另外通过对周口店遗址出土古人类烧火使用的紫荆的思考,说明古人对环境是适应的; 通过雄安新区发现核桃楸的例子,说明探讨气候变化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出土的考古资料. 另外提到,从新疆湿地五千年来的环境演变可以看出,人住的环境是比较好的,属于温干气候. 之后并举出了研究红薯、中药的案例,呼吁大家研究范围能做大一些,除研究古代主要的几种农作物之外,也要认识、研究更多的植被. 希望年轻的同志思路更开拓一点,各学科之间多渗透一点.

杨晓燕提到怎样理解文化交流中是技术的传播还是人在迁徙的问题. 例如很多地方都有尼安特人的基因,肯定他们之间还有人群交流的问题,这些人群是否带着技术. 王幼平回答从西到东的交流可能主要是人群,南下的可能也有人群,因为北边太冷了没法生存了,会整个随着气候带往南走,但可能还有技术交流,在文化上也能反映出来,尤其是到华北地区. 关于杨晓燕提到的例如主文化层是石叶,下文化层是石片技术,是否是掌握的技术. 王幼平回答,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现在还没法截然区分. 从技术上可以看出来,如果这一组石器全是外来的,包括从原料到技术,那应该是人群上的. 到了华北的南边你可以看出来更可能是技术的引进,因为这个地方原来有人,外来人来了不可能完全替代当地原住民,应该会发生的是两群人交流融合.

孔昭宸研究员提到研究植被讲究垂直或水平带,石器有没有这种差异. 王幼平回答,人跟植物和自然的确有区别,但是能也看出来相似的规律. 如中国北方的就是小的石片石器特别多,这是因为北边温带草原地区吃肉比较多,因此使用这种刃口锋利的工具多; 往南走砍砸器比较多,是适应在森林环境,这是水平分带. 垂直分带也有的,最早东亚来的人还是在低海拔的地方生活,人多了以后往高海拔的地方扩展. 我们可以看出来,刚才说的华北这边人多了以后会往周围扩展,到云贵高原就比较晚,这个可能就是垂直的分布.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张家富教授提出今天讨论文化交流传播,目前看似乎只讨论了传播没有提到交流. 赵志军研究员表示现在看来各种农作物的交流发生的时间相符,差不多都在距今5 000 ~ 4 000 a. 西边的小麦、大麦传入中国,而中国也有糜子(小米的一种) 传入西方,它传播的路线途径现在比小麦还清楚,比如说现在在中亚几个位置都发现了距今 4 500 a 左右的小米,在中欧地区出土了很多新石器时期的小米,通过年代测定,东欧地区发现的小米都没有超过距今 4 500 a,因此小米西传和小麦东传的时间大概是相同的,中国的小米传到中欧以后也确实给当地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就是交流,不是光传播. 王锦秀也表示,往外传的东西也有很多,丝绸之路就往外传了很多东西,如陶瓷等.

接下来,针对学者提问的海洋之路应该比草原通道更加快速的问题,赵志军研究员表示同意,并指出海洋之路可以是“蛙跳”传播,然而在陆地上不管草原通道还是绿洲通道,都必须一步一步渐进.

左昕昕副教授指出小麦源自西亚的地中海型气候区,夏干冬雨,而东亚季风气候则是雨热同期,从植物生理上讲是不适宜小麦生长的,那么距今 4 000 a 前后传入中国,是否与距今 5 000 ~4 000 a 中国东亚季风的减弱和季节性降水分配的变化(如较湿润的冬季和相对干旱的夏季) 有关. 赵志军认为环境变迁可能是距今 5 000 ~4 000 a 古文化出现转折的重要原因,但具体到小麦的传入,可能主要与文化因素有关. 当我们中国古代先民完全掌握小麦生长习性,创造出自己的一套种植小麦的生产体系和生产方法,并且能够有效的应用灌溉技术,小麦才真正能够在中国生长起来.

首都师范大学钟华博士以自己在中原地区做的植物考古研究为例,结合中南美洲的研究结果,论述了一种作物从传播到被当地接纳,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且并不是一蹴而就,可能中间隔几千年,而且最终被接纳的原因可能也并不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得考虑很多,包括小环境、当地人的饮食传统等.

张俊娜博士提出很多区域的环境考古研究都证明距今 5 000 a 有 1 次干旱事件,距今 4 000 a 有 1 次干冷事件. 孔昭宸老师等做的植物研究包括孢粉分析也证明在新疆地区距今 4 000 a 是冷湿环境. 但从很多考古证据来看新疆 4 000 a 是干冷环境,游牧化越来越强. 这就有些矛盾,如果环境是冷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湿,应该更适合发展农业. 是否是因为新疆冰雪融水的影响,导致气候是一个层面,地表又是另外一个层面.

莫多闻教授认为这实际上是气候变化规律的研究,大体规律上气温变化和降水是对应的,气候变暖降水增加,但也有可能存在一些差异. 做环境考古的时候,一定要把文化和遗址周围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考古也是这样,人类活动遗迹和自然遗迹得同时研究. 另外一个遗址内的情况和遗址外的情况得同时研究结合,这现在不仅是环境考古研究的要求,还上升为考古学研究的要求.

3 总结发言

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和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夏正楷教授分别作总结发言.

赵志军研究员首先肯定了"沙龙"这种会议形式,认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举办的三期"环境考古"主题研讨沙龙都给了学者充分的时间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产生思想碰撞和学术的火花,使参会者得到启迪,受益良多. 本期环境考古沙龙的主题很明确,文化交流是目前考古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今天实际把文化交流放在一个大的地理环境背景上去讨论,对我们认识古代文化交流有很多新的启示. 今天讨论的内容涉及到农业、彩陶、玻璃,石器,通过这几个典型范例来讨论早期的文化交流. 涉及的时间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再到历史时期. 从不同的文化交流内容和不同的时间发生的文化交流,最后都归集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内容上,传播的路线实际非常一致,主要围绕草原通道和绿洲通道这两条路线,在这么大的时间跨度间,古人的东西文化交流走来走去就这么两条路,说明了文化交流与地理环境确确实实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要讨论文化交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交流路线上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及其和文化交流的关系.

夏正楷教授指出今天会议的内容很广泛,从旧石器到历史时期,石制品、粮食、装饰品等都有了,很多文化因素都讨论到了. 并且也涉及到很多大的环境背景、文化、通道等. 讨论热烈,有很好的学术氛围,这种沙龙方式值得继续. 同时也指出本次会议的不足,首先,年轻学者的发言较少,他认为年轻人的思想活跃,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并希望年轻人要主动发言. 第二,本次沙龙考古学者讲的很好,有材料,有明确的观点,但环境考古方面的讨论没有展开,没有深入讨论地理环境对文化交流的影响. 实际上,地理环境一方面可能是文化交流的动力,尤其要综合考虑气候的影响,以及环境的放大效应; 另一方面,地理环境为文化交流提供了通道,环境和人的关系包括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人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 另外夏正楷教授也提到了聚落遗址的环境考古,认为把聚落的分布、聚落周围的环境状况、聚落与环境的关系搞清楚就是环境考古. 要一个遗址一个遗址去做,慢慢积累.

"环境考古"主题研讨沙龙(第 3 期)延续前两期的传统,以近年考古热门的"考古文化交流与地理环境"为主题,加大了讨论环节所占的比重,就中西交流、农业技术传播、古气候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参会学者均表示受益匪浅.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